

## 謐靜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美國海軍的水下聲音監測系統在某天收到了一段鯨魚的叫聲，這本該是平平無奇的事情，但和其他鯨魚不一樣的是，那像是一段不曾被聽見過的聲音。

如是我見  
劉譯坤

在浩瀚的海洋中，鯨魚通過超低頻率的叫聲跨越海洋來與彼此交流。一般鯨魚的叫聲大約會在二十赫茲左右，但不知是不是上天不小心開了一個小玩笑，這一隻離群鯨魚卻發出了五十二赫茲的叫聲，然而鯨類只能聽見二十赫茲以下的叫聲。換句話說，對於牠而言，其他的鯨魚全是聾子；但對其他鯨魚而言，自己卻是一個啞巴。這彷彿像是一個身處在人間的幽靈，明明處在人群卻無人知曉；明明無限接近人群卻觸摸不到誰；明明自己的存在如此真實卻沒有人陪伴。根據當時科學團隊的追蹤，這隻鯨魚從太平洋游到大西洋，獨自默默呼喚了二十年，然而沒有任何鯨魚聽見，也沒有回應，而探測到這聲音的人類卻根本無法理解鯨魚的言語。後

來卻追蹤不到，或許是因為牠累了，也或許是牠離席了，但我想用自己的靈魂靜悄悄地問牠曾知道何為陪伴嗎？牠又曾知道因為自己的獨特而只能聆聽寂靜嗎？

若是這隻鯨魚真的死亡了，那牠失去浮力的屍身便會慢慢地、靜靜地墜落在如同深淵的海底中。那是陽光滲透不到的黑暗，植物無法生長的不毛之地，但在這樣的地方，有着成千上萬的深海生物苟活着。而對牠們而言，一具緩緩落下的鯨屍，卻是一個從天而降的恩賜。食腐的深海魚類因啃食牠巨量的皮肉而被養活；更小的甲殼類生物則因寄生在牠龐大的骨架而得以生存好幾年；而最後剩下的骨架將會在腐化中釋放自己最後的光彩，不得已再次安靜地消散於海洋之中。

可悲的是，這隻跑調的鯨魚無論從生前還是死後，都未曾聽過一句話，乃至被幫助的整個深海亦無法和牠說句謝謝。但也可笑的是，人們曾默然理解跨物種的寂寞，卻未曾陪伴那些同物種的透明。



廿四節氣

## 夏至

「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今日迎來夏至節氣，此時節，日照充足，雨豐晝長，水稻揚花，瓜果漸熟。蛙鳴伴蟬吟，盛夏已然至。夏至是二十四節氣中第十個節氣，也是夏季第四個節氣。經過立夏、小滿、芒種的不斷蓄積，陽氣在夏至達到頂點，大自然籠罩在一片炎熱之中。

新華社

## 大會堂：反思的角度



流動空間  
方元

香港大會堂在六十周歲之際，收到一份賀禮：政府於五月二十日刊憲，將它列入建築的「名人堂」——法定古蹟名單，以表彰它對香港建築文化的貢獻。作為香港現代主義建築的「掌門人」，大會堂進入「名人堂」是早晚的事，只是沒想到它年僅六十就被選中，作了最年輕的古蹟。

大會堂於一九六二年建成，是「名人堂」中唯一的二戰後建築。它的獨特性和重要性表現在哪裏呢？根據古物古蹟辦事處（古蹟辦）的解說詞，我們可以歸納出三點：第一，它是「首個向香港所有市民開放的多用途文娛中心」；第二，它是「舉行多項重大歷史事件（例如五位港督的就職典禮）的場所」；第三，它是「重要的現代主義建築，引領了當時香港的建築潮流」。由此可見，大會堂不僅有建築意義，而且有重要的社會和政治意義。

古蹟辦確實抓住了要點，但問題是，他們的評述只有讚揚，而沒有反思。既然建築是立體的，那麼我就從反思的角度給大會堂畫一張透視圖。

首先，說一說它的建築意義。大會堂確實是一座重要的建築，但說它「引領潮流」就有點似是而非。「引領潮流」的建築通常是這個藝術流派的第一座建築，但大會堂並不是香港的第一座現代主義建築。大會堂建於二戰之後，但在二戰前，現代主義建築已經來到香港，例如中環街市和灣仔街市。那時，英國人把現代主義看作是來自德國的「外國的建築」，心存芥蒂，不願接受，因此它難登中環的「大雅之堂」。

中環是香港建築的天際線。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中環的天際線仍保留着十九世紀維多利亞時代的輪廓。一九六二年，大會堂站在新填海的土地上，甩掉「舊中環」的帽子，以新的面貌做出告別過去的姿態。這個轉變反映了當時國際形勢的變化。二戰後，美國取代英國，成為西方國家的老大。在建築上，美國編織了德國「包浩斯學派」的人才和思想，成為現代主義的旗手。固執的英國人不得不放下貴族的身段，接受這種不分身份的建築風格。年輕一代的建築師不願再走英國建築的老路，而更喜歡從美國和歐洲大陸尋找新的創作方向。大會堂的建築師菲利普斯（R. Phillips）就承認，他的設計理念來自包浩斯學說。所以，大會堂的意義不是「引領」，而是轉變了香港的建築潮流。

其次，講一講它的社會意義。古蹟辦說，大會堂見證了港英政府「肩負起豐富

市民文化生活和改善他們生活水平的責任」。不過，如果讓那些住在寮屋區和徙置大樓的人來寫他們的建築，見證的角度就不同了。即使讓英國人來寫，也未必能像古蹟辦那麼樂觀。前港台記者白莎莉（S. Blyth）說，港人的生活狀況令她想起狄更斯描寫的十九世紀英國勞工的悲慘生活。前港英政府官員麥理覺（J. McGregor）承認：在五十至六十年代，香港「沒有什麼人權，有的只是生存的權利，而這要靠你自己」。

大會堂不僅是建築風格的變化，也反映了英國對殖民地政策的變化。二戰後，英國在各地的殖民地紛紛要求獨立，「日不落帝國」搖搖欲墜。為了維持殖民地的統治，英國認識到不能單靠暴力鎮壓，還要用「文明」收服民心。用英國陸軍元帥鄧普勒（G. Templer）的話說：對付殖民地人民反抗的辦法「不是給戰場增加兵力，而是給民心增加兵力」。於是，在統治了香港一百二十年後，港英政府終於想起要建一座「向所有市民開放」的大會堂。

面對港人對殖民主義的反感和憎惡的情緒，過去那種代表帝國的古典建築顯然已不合時宜。而「國際風格」的現代主義建築是一種抽象的、功能主義的、歷史虛無主義的萬花筒，既可以給人們帶來現代化的憧憬，又可以抹去某種特定的國家和民族的文化身份。不過，英國人想做的不是「去殖化」，而是「去中國化」。

大會堂描繪的現代化願景是美麗的，但殖民統治的現實仍是殘酷的。在大會堂開幕五年之後，殖民統治長期積累的社會矛盾終於引發了香港二戰後最大規模和最激烈的反殖運動。當年鎮壓「對抗事件」的署理布政司姬達（J. Carter）承認：「一九六七年的反英抗暴鬥爭，事後被證明是香港社會發展的轉折點。它使香港政府開始關注本地人的需要，它也是七十年

代發生巨大變化的催化劑。」

最後，談一談它的政治象徵意義。早在籌建的階段，香港市政局主席彭德（K. Barnett）就明確指出：大會堂「將開創新的建築秩序——香港自己的伊麗莎白新秩序。」如他所願，大會堂與皇后碼頭和愛丁堡廣場在中環形成一個新的建築空間秩序——舉辦官方儀式的舞台：新任的港督乘船在皇后碼頭登岸，在愛丁堡廣場檢閱儀仗隊，然後在大會堂宣誓就職。一九七五年和一九八六年，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訪港時，也是在此登岸，檢閱儀仗隊，在大會堂發表演說。這即是古蹟辦說的「重大歷史事件的場所」。

隨着時代的變化，大會堂的故事也在變。近年流行的兩個新觀點是：一，大會堂「與殖民地的建築不同」；二，香港建築挪用現代主義作為「反殖的象徵」。這兩個觀點互相呼應，可以合成一個故事：現代主義的大會堂不是殖民地的建築，而是反殖的象徵。

我認為，現代主義建築是不是反殖，那要看誰在用它，以及怎麼用它。事實上，「伊麗莎白的新秩序」是通過建築形象和空間序列來體現殖民統治的秩序。在這個秩序中，大會堂不但不反殖，而且是它的一個組成部分。大會堂建成的時候，香港仍是「殖民地」，不會因為建築風格變了，它就不是「殖民地的建築」，就可以洗白了。當現代主義建築被殖民統治者掌握在手裏，由他們自上而下推行時，即使它曾有反殖的因素，此時也被抽走了，已對殖民統治無害了。

在講述歷史建築時，一個真實的故事比一個美麗的故事更重要。一座歷史建築即是一座小博物館，具有公民教育的功能，因此我們要實事求是，不要因為那座建築是美的，就把它的歷史和社會意義也說成美的。古蹟辦如何向市民講好建築的故事，這也是一個需要反思的問題。



香港大會堂是具現代主義風格的建築。

作者攝

##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

偶然遇到義賣活動，一個學生模樣的人在攤攤。我一眼就相中了正中間的冰墩墩。蜷曲而堅硬的紙皮，居然被做成了冰墩墩的模樣。那個女學生告訴我，這是用瓦楞紙做的。



人生在線  
郭曉懿

我問她是代表學校義賣的嗎，還是哪個文化機構？她指了指胸前的字樣，居然是廈門市特教學校。原來這是廈門市特教學校的義賣活動，善款用於廈門市特教事業。因為網絡連接問題，在現場折騰了很久，也因此與特教學校的老師聊了起來，才知道他們那裏主要是孤獨症兒童和智力欠發育兒童。老師順便提到了製作這個冰墩墩的，是特教學校的孤獨症兒童，她和我說，這是個症狀有點嚴重的孩子做的。

我仔細端詳着手中的冰墩墩，水汪汪的大眼睛，用紙皮



▲用瓦楞紙做的冰墩墩。作者供圖

做了一縷小鬍子，胸前貼着北京冬奧會的徽標，用七色綢帶圍住了周身。讓我印象深刻的，是它手中舉起的那顆紅心，召喚着我們。特教學校的孩子們雖然身處孤獨症的陰霾中，但是依然手藝靈巧。

我覺得，就算讓我做，都沒他做得好。

不是因為他們是特教兒童，就另眼相待，或是有所區別。而是從作品中，看到了他們美好而豐富的內心，以及過人的能力。在我看來，這才是對特教兒童的正確對待和理念：視為普通兒童，並從他們的活動中，甄別出每個人的特質和相應的閃光點。

這讓我想起了孤獨症機構「星星雨」。因為我和機構的老師有一面之緣，所以提了一句，認識一個老師就在做孤獨症的領域。特教學校的老師說，剛好也認識他，因為去北京的「星星雨」培訓過，在那裏考過孤獨症培訓的證明。我本來以為自己和 Special Education（特殊教育）領域挺遙遠，沒想到遇到的人和事與他們息息相關。

我不禁感慨：世界好小，聯想起了十六世紀英國詩人約翰·多恩著名的詩句：「沒有誰是一座孤島，在大海裏獨踞。每個人都像一塊小小的泥土，連接成整個陸地。」

孤獨的人從來不孤獨。我們都是世界的一部分。

## 我與大公報

## 三代人的《大公報》情緣

陳冠宏

凌晨，我拿着有溫度的《大公報》……

作為一個「發行佬」，我拿到的《大公報》，都是帶着溫度和墨香的。

每天凌晨，當報紙由印廠「出世」，接下來的就是我們「發行佬」的工作了：貨車司機先從印廠把一扎一扎的報紙運到市區，接着由報紙分發員接手，在中環、灣仔一帶的分報點，嫻熟地按照A、B、C疊的順序，快速理好，然後再交給報販，或者轉運報攤和便利店……當大多數市民還在酣睡的時候，新鮮出爐的日報就按照這樣的程序擺放在報攤和便利店

的貨架上。

說起來，我和《大公報》的緣分可以說是「天生」的。我的祖父早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已在中環經營報刊發行，代理《大公報》的發行，及後由我父親、母親接手，十多年前，當我從海外學成歸來，隨即接棒，傳承與《大公報》之緣分。

大概是六、七歲吧，一個凌晨，忘記了是什麼原因，父親帶同我前往灣仔軒尼詩道國華商業大樓，等待「出紙」，詳細的場景已隨年月長久而淡化，但今天依然清晰記得的是，當時拖着爸爸的大手，好奇地摸過仍然溫熱的《大公報》「頭輪紙」。及

後，爸爸帶着我前往中環德輔道中的電車路，觀看一眾夥計熱火朝天疊報、分紙的畫面，這一幕成為我進入報刊發行行業的啟蒙。

因為家業的關係，家中每天都有當天不同的報紙，令我自幼已習慣報紙油墨之香。而識字之後，對《大公報》尤感親切，因為當時覺得這份報紙名字起得好，「大公」二字易記易認，遂成為我記憶中第一份報紙的名字；及後年歲漸長，也曾遍覽群報，若說對於中國文字、文化及國情的興趣和投入，除了長輩的叮囑之外，離不開眾多報紙副刊的薰陶，當中自然少不了《大公報》的「大公園」和

「小公園」。

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二十五周年。猶記得二十五年前，香港回歸當天，爸爸接了一份重要工作——將當天所有的香港報紙包括《大公報》，每家報紙百多份，第一時間運上內地。當時父親顯得頗有壓力，一直在旁監督，從頭到尾跟進，更和夥計們一起疊報、分發和運送，幸喜最後及時順利完成。這也是我們「發行佬」當年喜迎香港回歸的一種參與吧。

回望過往點點滴滴，即使傳媒不斷發展，網絡日新月異，但是報紙始終都有讀者，而報館和發行公司的關連依然緊密，我與《大公報》的緣分

更為深厚。

作為香港報紙發行業的一員，我深知《大公報》過往一百二十年的不易與艱辛。《大公報》百廿年來走過無數風風雨雨，時至今日不僅屹立不搖，更成為愛國媒體之標杆，實在離不開無數有志之士的背後辛勞和眾人

之智。值此時刻，能向《大公報》說聲「生日快樂」，實在與有榮焉。期待《大公報》的一百三十、一百四十年時創造新的輝煌，也祝願祖國繁榮昌盛、香港繁榮穩定。

報紙發行從業員  
(標題為編者加)